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效应

——基于公共物品博弈的实验研究

李建标^{1,2,3}, 刘晓丽^{1,2,3}, 李维安^{1,4}, 付晓改^{1,2,3}

(1.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 2.南开大学商学院,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协同创新中心, 4.天津财经大学, 天津 300071)

摘要: 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致同意或多数同意原则下公共选择的结果。当批评与自我批评还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作风时, 她更多地标识了中共与其他政党的区别, 而对中共党内成员或组织的约束力则很不稳定, 表现为该作风被弘扬得好时, 党内就风清气正、力量就强大、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 该作风被丢掉或者歪曲时, 党的事业就会受损失、就会走弯路; 当批评与自我批评被升华为制度安排时, 它的功效将会相对稳定, 因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在满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基础上能够自我实施。党的基层组织在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约束下的行为取向是突破社会困境的合作, 公共物品博弈实验会揭示这一过程中的互动机制, 为中共的现代化治理提供理论信息。

关键词: 批评与自我批评; 制度效应; 公共物品博弈; 实验研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 这源于 1945 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的第一次明确概括,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 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 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作作风以及自我批评作风。”^[1]三大作风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党内生活和党的工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迄今, 党的三大作风在新的形势下又有了新的发展, 其中批评与自我批评被升华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2],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已开始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上升为制度层面加以认知和规范。

制度作为面向多人的一种规则, 其形成是一致同意或多数同意原则下的公共选择过程。当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作风时其约束力就相对不稳定, 因此就出现了“什么时候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弘扬得好, 党内就风清气正, 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强, 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 什么时候丢掉或者歪曲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缺点错误就难以得到纠正, 党的事业就会受损失、就会走弯路”。^[3]当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一项制度安排时, 她的功效可能会正向地相对稳定, 因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在满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的基础上能够自我实施。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安排发挥作用的地方是一个具体的党组织——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党支部, 置身于党支部中的决策者——党员——在这一组织中同样面临个体和集体的利益一致性和冲突性的社会困境问题, 也就是说党的具体组织中个体党员之间的行为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物品博弈结构, 公共物品的本质问题是搭便车引起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为解决这一问题学者们研究了诸如惩罚、信息披露等多种能够增加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4]从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组织角度看, 其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安排很可能是增加组织产出(提高组织效率)的重要的制度创新, 中共向来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方法。我们按照评判引导式的批评和内省式自我批评等要求建立对应的语句库, 利用公共物品博弈结构, 在基准实验的基础上嵌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规则, 进行比较制度实验研究, 获得批评和自我批评与公共物品自愿供给之间的数

据，考察该制度与决策者行为的互动机制和制度效应。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绩效：理论与假设

毛泽东最初设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共产党内部矛盾的方法，^[5]这个党内矛盾是党员个体在具体党组织中的行为冲突，其基本的行为互动结构为公共物品博弈。

（一）党组织与公共物品博弈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近九千万党员的庞大执政党，它的作用主要通过各级党组织体现出来，但是每一名党员个体却直接分属于不同的基层党组织——主要是党支部，基层党组织被认为是党团结群众、组织群众、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客户端”，而且是党调查民意、赢得民心、紧密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支部设置、班子建设、制度建设、教育管理等方面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支部是党教育、管理、监督党员干部的基层组织，是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任务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它的设置方式和功能定位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演化。建党初期，源自独特制度安排的嵌入型基层党组织生成和发展，“支部建在连队上”、“支部下乡”、“支部进居”接连出现，直至改革开放前，党实现了对全国基层政权、军事、经济、社会组织的统一领导，由最初的“革命党”成长为“领导党”。^[6]改革开放推动社会结构和制度发生变化，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兴起侵占了嵌入型基层党组织的实施空间，党组织开始向服务型转变以满足政党控制和社会治理的需求。整个演化过程的关键在于基层中党组织与社会的协同方式，适应社会现状的合理的协同方式利于组织动员和调动组织力量，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是动员和调动过程中的桥梁。在基层党组织中，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制度是设置方式的体现及功能定位的矫正器，时刻保持基层党组织的功能与活力。其制度效应的发挥空间可以通过下述无成本学习模型证明。

沿着 Carrillo 的逻辑，^[7]在非连续性时间、无成本学习和制度效应的基础之上提出本文的理论模型。非连续性时间用 $t=1, 2, 3, \dots$ 表示，借以描述个体动态的不连续偏好。每一期的决策者（以下简称 DM，即 decision maker）都是风险中性的、可数的，用 $DM-t$ 表示在第 t 期时 DM 的效应感知状态。在每一期中，决策者都会获得 10G\$ 的初始资金，他们可以选择投资 0-10 之间的任意整数。我们用投资资金/初始资金的比例 $x_t \in [0, 1]$ 表示在第 t 期时的投资。本期中的投资除了会增加本期中的投资效用提高本期感知效应外，还会对未来期中的投资产生一个引导作用。确切地说，DM 在第 t 期中的投资行为将会以 α 的效率对其后的所有期数 $t+\tau$ ($\tau \geq 1$) 产生 $\lambda^{\tau-1}C > 0$ 程度的影响，其中 $\lambda \in (0, 1)$ ，表示本期的投资决策对未来期中近期的影响较大，远期未来决策的影响较小。总体来说，第 t 期的投资行为对其后的所有期 $t+\tau$ ($\tau \geq 1$) 的影响用 I_t 表示， $I_t = \sum_{\tau=1}^{\infty} \lambda^{\tau-1} x_t \alpha C$ (1.1 式)。从 1.1 式可以看出， I_t 与 $\{x_t\}_{t=0}^{t-1}$ 是可分离的，也就是说在第 t 期中，由未来 $t+\tau$ ($\tau \geq 1$) 期引发的投资效用与过去 $t-\tau$ ($1 \leq \tau \leq t-1$) 引发的投资效用是独立的。在第 t 期中的本期效应为 u_t ， $u_t = x_t + I_t$ (1.2 式)。给定外部成本时，即期投资的边际效用与过去投资是独立的，且 I_t 在未来 $t+\tau$ ($\tau \geq 1$) 期中不能被直接观察，所以每一位 DM 在第 t 期不知道自己在本期中精确的实际效用。因此，影响每期决策行为的因素还是小组成员投资到公共物品以及各自投资行为的反馈。偏好为动态时人们内心存在冲突，对于第 t 期中的 $DM-t$ ， $t+\tau$ 期 ($\tau \geq 1$) 的影响系数等同于 $\beta \delta^\tau$ ($0 < \beta < 1$)，^[8] 则第 t 期中的 $DM-t$ 的总效用为 $U_t = E_t(u_t + \beta \sum_{\tau=1}^{\infty} \delta^\tau u_{t+\tau})$ (1.3 式)。 β ($0 < \beta < 1$) 表示相对于未来的投资决策而言，现在的投资决策更加重要， β 越接近于 1 时， $DM-t$ 本期的投资行为对于未来的投资行为的影响越大。每一期中，本期的投资决策都考虑到了未来期的投资决策，并且本期中的决策带来即时效应的同时也影响未来各期的效应。从第二期开始，在作出自己的投资决策之前，每一个 DM 都有机会不花费任何成本的收集信息，

并且这些信息可以毫无损失地全部贡献于下一期的决策。出于制度记忆和投资效用，每一个 DM 需要收集上一期的投资量和收益信息，然后再决定下一期中的决策。实际上，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程度 DM 是有一个权衡的。一方面，在公示全部信息下，团队内的每一个投资者可以做出自己的最优决策；另一方面，这些信息在未来的所有期数中都可以依附记忆存在。对比 1.2 式和 1.3 式：从单一 DM-t 来看，第 t 期和第 t+1 期的投资行为的边际替代率为 $1/\beta \delta$ ；从整体 DM-t 来看，第 t 期和第 t+1 期的投资行为的边际替代率为 $1/\delta$ 。因此，某一个 DM-t 的最优投资策略对于其他 DM-t 来说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团队中所有的 DM-t 很难形成一致行动，个人利益和团队利益冲突的困境显现。具体到党组织公共决策过程，说明批评与自我批评存在发挥制度效应的空间。

党组织公共决策以维护党的形象为基本目标，提供党的形象这一非物质性的公共物品。党的形象看作是公共物品是因为其满足了公共物品的两大基本特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每一位党员都可以从良好的党的形象中获益，没有党员可以例外。同时，任何一位党员消费了党的形象带来的好处都不会降低其他党员的效应水平。党员从党的形象中获利的同时也承担了提供这种公共物品的责任。目前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外部惩罚或者监督机制的督促作用，另一种是考察行为人自愿合作的内部驱动因素。公共物品机制中的惩罚正好与批评制度相匹配，受到惩罚者会有利益损失并丧失同伴信任，同样对于受到批评的党员而言，批评是对自己的否定，会产生形象损失和挫败感，两者都是外在层面上的鞭策。公共物品中的驱动因素和党员的自我批评都是从内在层面上的激励。因此，基层党组织决策的本质是公共物品博弈。

（二）评判和引导的批评制度与公共物品投资

在动态公共物品博弈框架下，惩罚机制的设计首先是为了提升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水平。在没有信任的情况下，团队中的成员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依据自身利益做出决策，而不是考虑团队合作或团队利益，这将导致团队成员缺乏组织认同感，彼此之间缺乏合作的热情，不利于组织内部交流。团队成员又是有限理性的个体，有限理性的本质就在于经济主体无法客观地把自己当做无价值负载的客体。经济主体受自我主体的影响，导致过高估计自己物品的价值，自身利益侵害团队利益、产生冲突。因此，冲突的管理就成为团队提升自身效率关键。积极的冲突管理能够有效地缓解集体内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生成良好的团队互动。合作性冲突管理则通过提升团队反思水平来提高团队绩效。^[9-10]其次，惩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冲突引起的合作破裂，当同一个群体中同时参与决策的不同个体获得不均等公共物品的收益时，会引发优势收益和劣势收益成员冲突，增加合作的难度，此时惩罚促进合作的效果明显。^[11]外部惩罚的存在使团队内良好的互动获得制度层面上的保障，群体成员之间建立初步合作成为可能。

从个人而言，人们天然具备的“言行一致”的愿望也使得群体成员的合作存在可能性。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旦作出了一个选择或者是坚持了某个立场，立时会碰到来自自己内心和外部的压力，“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内疚和成本迫使我们履行承诺。这一方面是内心的压力要把行为调整的与先前树立的自我形象相一致，另一方面外部隐形的压力会迫使人们按照他人对自己形象的期望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正常人都会想方设法的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遵守了之前的决定，为自己树立“言而有信”的正面形象。

复杂的合作环境对我们的体力、脑力乃至精力都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成员间评判后惩罚威胁的存在和“一致性”处事原则的引导产生了促进合作的效应。批评制度不仅是党组织在提供党的形象这一公共物品时对党员的监督惩罚机制，它同时也包含着组织对每一位党员的期望和行为引导。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一(H1)：

基于评判和引导的批评制度对公共物品投资量具有正向影响。

（三）内省的自我批评制度与公共物品投资

在公共物品框架中，“内省”首先实现个体的自我认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12]公布上期决策结果后对自身决策进行分析、反思，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战胜自私自我、显现利他自我，突破现有的合作瓶颈。其次，“内省”促使群体活动可控。通过对群体成员的行为施加内省干预，帮助群体制定合适的策略。在个人决策方面，内省强调自己的主观经验，是对心理现象所遗留的“最初记忆”进行观察后反思过去行为的过程。在群体决策方面，团队自省对团队效能产生积极影响，高自省性的团队善于反思、讨论，群体成员各施所长、协调合作，相互鼓励、彼此尊重，提升心理安全感，实现相对理性的选择。自省中成员往往会意识到团队行动的影响，审视内部环境，据此进行调整或者改进，在组内形成一种良好的依据成员的内省与行动实现的动态互动机制，提升团队合作水平。

内省性不仅对角色内绩效具有积极作用，对角色外绩效（组织认同）也具有积极作用。博弈者通过内省不断进行公与私的斗争、理性与欲望的较量，确立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的同时也取得群体其他成员的认同。内省时群体成员对群体的目标进行公开反省和沟通，以适应当前或者预期的变化。在观察自身和他人行为的同时群体成员之间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类基于群体成员心理的内省性认知行为的路径可以简化为“效应感知—行为—结果”，^[13]即个体的心理感知会影响到其决策行为，个体决策行为将导致群体决策的最终结果。此过程中，群体决策存在不确定性，群体行为处于动态之中，通过内省实现公与私、是与非博弈中的自我提升，确认行为方向。心理学中社会认同原理也认为，当我们看到别人都在做相同的事情，就会觉得这种行为是恰当的或者是符合社会规范的。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如此，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事情也的确是正确的或者说是应该做的事，无论是出于跟风还是决策保险性的考虑，我们会不同程度参考别人的行为后对自己的行为做出相应的调整。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时刻将自律和自省放在第一位以应对严峻而复杂的形势。党员自律的前提是内省。自我批评制度可以看作是基层党组织提供党的形象这一公共物品时党员内省的载体。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二（H2）：基于内省的自我批评对公共物品投资量具有正向影响。

（四）批评和自我批评与公共物品投资

批评源于外部社会群体环境对个体行为的约束，自我批评源于个体自身内部心理的行为评价。这分别归结于人与生俱来的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作为社会人来说，人人具备社会身份，社会经济环境、社会现行制度规范从外部对人们的决策行为作出了规范、要求和限制；另一方面作为自然人来说，每个人都是异质的，人身方面的特质各不相同，合作、不合作，鹤立独行、谨小慎微……这些不同的人格特质从内部引导了人们的决策行为。受限制和引导的决策行为大大提升了环境不确定性下个体和群体合作行为的科学性和效率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而言，1982年修订的党章是党组织制度化的重要标志，是政党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成为党实现自我治理的重要依据。党章构建了党治理的外部环境，是党员之间互相批评的评判标准。同时，若将制度看作是群体信念的集合，那么党章必然源于党员的集体约定与权力协商，体现了党员的主观偏好，是党员自我批评的内在范式。因此，党章的确立也决定了自律和内省是党治党的利器。外在法治与内在自律成为党治理范式的必然选择。

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是党员从外在和内在两方面实现治理的重要机制。批评是批评者自身不满情绪的发泄，是对被批评者的一种惩罚，这种源于负面情绪推动的机制是发泄对于公共物品投资项目中“搭便车”不公平行为不满情绪的需要。^[14]但是，当对他人施加惩罚存在成本时，发起惩罚的个体并不是不考虑代价的纯粹进行

负面情感的宣泄，随着惩罚成本的增加其施加惩罚的力度会逐渐降低。^[15]惩罚有时还会引起伙伴对惩罚行为进行故意报复，引发反惩罚行为。因此，在动态公共物品博弈框架下，惩罚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是由于惩罚威胁而产生的促进合作的效应，二是由于逆反心理而产生的毁灭性效应，因此最终惩罚对于合作的效果就是看这两种效应哪个更胜一筹。

“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16]将法治与自律有效结合，促进党治理的良性发展。带有惩罚色彩的批评机制确实有促进合作的效应，但其对抗性的报复效应又会抑制合作，最终对于合作的效应存在不确定性。同时，惩罚机制在动态公共物品博弈的合作效果促进方面只是量上的微增，而难以维系质上的结果。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三（H3）：批评与自我批评能提高公共物品投资量，自我批评的制度效应优于批评的制度效应。

二、研究范式和数据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是政党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决策，伴随着以规则和责任为导向的多主体的参与，是政党的一个公共选择过程。本文将展示一个嵌套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的公共物品自愿供给的实验经济学研究结果，为其逻辑关系提供实验证据。

（一）研究范式

公共选择理论实质上是将政治看作另一种形式的市场，用经济市场中“理性人”理论分析公共组织的决策过程。因此，经济市场中存在的研究范式可以用于政治市场。政党作为一种公共组织，其治理与市场治理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同无形市场治理降低成本相似，党的治理要降低党组织的管理成本，获得基层党组织的微观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宏观治理效益最大化，这是政治市场的理性所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的参与者相同，参与者在政治市场中决策行为必然具备经济市场中理性人的特征——严谨的思绪，没有任何制度框架的记忆和牵绊，依据期望效应最大化来决策，这是自然人的理性。自然人的理性规律是人类本性问题上的必然规律，即使是怀抱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共产党员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个规律的支配。党员是党小组群体决策的参与者，作为公共决策的一般参与者他们具有“理性人”的自利动机，这是党员理性中人性的必然。这种必然促使党员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将政治活动看作市场，党员作为自然人本身的自利偏好显现。但是，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现实中完全理性的自然人几乎是不存在的，人们生而也是社会人，是社会群体的产物。社会性迫使人们的决策行为更倾向于有限理性，决策主体即是经济人，也是行为人、心理人。因此，同时具备理性人、行为人、心理人三大特征的党员个体作为党组织公共决策过程的参与者，注定该过程的实质——维护党的形象的公共物品博弈。

但是，由于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数据在实践中很难准确的获得，其供给程度以及后果的影响就更加难以考察。随着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广泛被接受，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来测度公共物品的自愿供给，通过实验室研究来克服数据收集的困难。实验经济学可以在实验室中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决策情景，再现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方便实验者观察特定决策环境下异质性个体的决策行为。实验过程中使用价值诱导方法，促使被试展现给定社会角色的特征，然后比较和评估不同实验设置下被试的决策行为，运用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找出个体的“社会性”和“自然性”，解释现实世界中难以直接考察的各种制度绩效背后的驱动因素。实验经济学规避了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展现出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特质，打破了社会科学不能实证的桎梏。作为一种方法论经济科学，Alvin Roth 教授形象地将它的作用概括为“与理论家对话”（speak to theorists）、“寻找事实”（search to facts）和“在君主耳边低语”（whisper in the ears of princes），

强调其检验已有理论、发现新的经济规律和制定测试经济政策方面的作用。^[17]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史密斯认为实验方法更加接近现实经济世界，完全可以在实验室中构造出与理论假设相并行（parallel）的微观经济系统。^[18-19]因此，既然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员这种特定社会角色在党组织公共选择过程中的行为，那么可以用实验室实验再现党组织的决策过程，分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效应。

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尽管必要的外界条件或者说外界影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毕竟“外因”发挥作用的同时需要“自我”的驱动和激励，需要内省性“自我”随时随地对自身先前的认知、以往的行为进行反省和剖解。然而通过梳理，我们发现目前的研究大都将“外因”和“自我”分离开来：在公共物品的相关研究中，现有的文献要么研究外部惩罚或者监督机制的督促作用，要么考察行为人自愿合作的内部驱动因素，没有发现将外部监督和内部驱动相结合的相关文献；在内省的研究中，尽管有研究提出团队内省会参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但是仍然没有发现明确提出将外部与内部相结合的观点。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研究中：在研究内容方面集中于思想、概念和方式，缺少效率的相关研究；在理论解释方面，没有发现从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进行的相关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的研究大都局限于文字的论述，缺乏数据的支持。因此，用公共物品博弈的实验研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效应，延伸了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理论在政治市场的应用范围，反过来也补充了现有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研究。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使用公共物品博弈的实验框架，通过实验室构造出不同的决策环境，详细且较为客观的考察被试的公共物品自愿供给行为，获得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公共物品自愿供给之间关系的证据，并且应用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有关理论检验和解释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效应。在个体微观层面运用控制性的实验方法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效应定量分析，与此同时通过不同的实验设置在分别分析两种不同制度的效应的基础之上将内外因相结合，披露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既涉及了群体外部监督惩罚机制、信息识别、社会认同和环境压力，也涉及了个体参与人的心理感知、内省、反思以及言行一致等内部驱动因素，拓展现有的研究。此外，考虑到现实中语言的丰富性，实验中依据前人量表和研究建立批评与自我批评语句库，并进行前测检验，确认其有效性。实验中被试的每一次选择可以看成是“再谈判”，再谈判的可能性改变了原有的供给状态，使考察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效应成为可能。

（二）实验原理、设计与过程

公共物品实验中，个体的效应函数为 $u_i = m - x_i + \theta \sum_{i=1}^n x_i$ ($1/n < \theta < 1$ 且 $\theta > 0$)，其中 u_i 、 x_i 分别为个体 i 的总效应和公共物品贡献量， m 是初始禀赋， θ 是系数（个体从公共物品中的获益程度）， $\sum_{i=1}^n x_i$ 是公共物品总供给量。对上式中 x_i 求导得 $\partial u_i / \partial x_i = \theta - 1 < 0$ ，意味着个体存在搭便车的动机。群体的总效应 $\sum_{i=1}^n u_i = \sum_{i=1}^n m + (n\theta - 1) \sum_{i=1}^n x_i = nm + (n\theta - 1) \sum_{i=1}^n x_i$ ($1/n < \theta < 1$ 且 $\theta > 0$)，对 x_i 求导得 $\partial (\sum_{i=1}^n u_i) / \partial x_i = n\theta - 1 > 0$ ，个体都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初始禀赋时群体效应最大。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公共物品框架进行实验室实验，重点考察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效应。实验包括若干决策小组，每个决策小组由相互独立的决策者（A、B和C）组成，每一个决策者独立决定将10 G\$的初始资金（实验开始时由计算机给定）中的多少（0-10之间的任意整数）投入到其所在小组的公共项目以及多少留给自己。本实验共分为三个设置：设置I基准组，设置II自我批评组，设置III批评组。设置I基准组：投资者A、B和C都要选择0-10之间的任意整数的G\$投入到小组公共项目中，当小组内的所有成员都做出决策后，公布本期公共项目总的投入点数以及A、B和C各自投入的点数和收益，确定后实验进入下一期；设置II自我批评组：在设置I的基础上显示投资量和收益之后，展示自我批评语句库，让A、B和C从语

句库中选择出符合本期自身投资情况的描述，全部选择完成后，公布选择结果，确定后实验进入下一期；设置 III 批评组：与设置 II 的区别是将自我批评语句库换为批评语句库。

实验于 2015 年 9-10 月在南开大学泽尔滕实验室进行，实验程序平台为 Z-tree3.2.1。本次实验共有 81 名被试，均为南开大学在读学生，未参加过类似设计的实验。实验为有偿实验，实验报酬取决于被试的投资决策，实验结束后随机抽取一期按照 1 G\$=1.5 元的比例支付现金，被试平均收益为 28 元人民币。三个设置各进行 10 期，平均持续时间 80 分钟。

正式实验开始之前，抽签决定被试的身份类型（整个实验过程中保持不变）。实验开始时每位被试会获得一份实验说明，他们有 3-5 分钟的阅读时间，之后实验主持人讲解实验说明，对存在疑问的被试进行私下解答，发放测试题确保被试掌握实验内容，随后被试进入实验区进行实验。实验过程中每个被试均通过独立并且相互隔离的计算机终端连接到实验室服务器上，A、B 和 C 随机配对组成一个小组，配对完成后实验开始。实验开始之前所有被试都会被告知实验全过程是匿名的，整个过程中不能通过任何方式与其他被试进行沟通和交流，结束后被试私下依次领取现金。

三、实验数据分析

实验中被试对自己行为表现的满意度为 2.17，介于比较满意和一般满意之间，满意水平较高，基本可以表现出被试内心的真实想法。愧疚感为 1.41，当自己的投资量少于小组平均投资量或由于自己而使得小组成员的收益普遍较低时会感知到较高的愧疚水平。信息披露的有效性指数为 1.12，说明被试会根据自己上一期的投资和收益进行下一期的决策，这与模型推导的结果相一致。

（一）描述性统计

被试具体的描述性统计信息见表 1。实验被试平均年龄 22.2 岁，其中，47 名女生、34 名男生，22 名党员、59 名非党员，42 名本科生、39 名研究生，39 名有经济学知识储备、42 名无经济学知识储备，41 名独生子女、40 名非独生子女。69 名家庭人均收入 6000 元及以下，占 85.2%，52 名来自城市，占 64.2%，说明被试大多来自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

表 1 被试描述性统计信息表

类别	项目	人数
性别	女生	47
	男生	34
政治身份	中国共产党党员	22
	非中国共产党党员	59
学历	本科生	42
	研究生	39
经济学知识储备	有	39
	无	42
是否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	41
	非独生子女	40
家庭人均月收入	2000元以下	22
	2001-4000元	26
	4001-6000元	21
	6001-8000元	6

	8000元及以上	6
生活环境	一线城市	3
	二线城市	15
	三线城市	19
	县城	15
	农村	29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 变量定义与趋势分析

数据分析中的主要变量见表 2。投资量类变量包含个体本期投资量(Con、ConA、ConB、ConC)、个体滞后一期投资量(Con_{t+1}、ConA_{t+1}、ConB_{t+1}、ConC_{t+1})、个体本期投资量均值(ECon)和个体滞后一期投资量均值(ECon_{t+1})、小组本期总投资量(Sum)及其均值(ESum);收益类变量包含个体本期收益(Pro、ProA、ProB、ProC);程度类变量包含小组本期批评与自我批评程度(SumG)及其均值(ESumG)、自我批评组中个体自我批评程度(SumSA、SumSB、SumSC)、批评组中个体批评他人程度(SumOA、SumOB、SumOC)和个体受到他人的批评程度(SumBA、SumCA、SumAB、SumCB、SumAC、SumBC)以及引导类(EmoG、RatG、EmoA、EmoB、EmoC、RatA、RatB和RatC)。其中对于上述变量中有关程度的测量都使用相对应的语句库中被选择的语句数量。另外,性别(Gender)和是否党员(CCP)为控制变量。

表 2 变量描述表

变量代码	变量名称及描述	变量代码	变量名称及描述
Sum	小组本期总投资量	Con	单个被试本期投资量
SumG	小组本期批评与自我批评程度	ConA	被试 A 本期投资量
ESum	小组本期总投资量平均值	ConB	被试 B 本期投资量
ESumG	小组本期批评与自我批评程度均值	ConC	被试 C 本期投资量
SumSA	自我批评组 A 本期自我批评程度	Con _(t+1)	单个被试滞后一期投资量
SumSB	自我批评组 B 本期自我批评程度	ConA _(t+1)	被试 A 滞后一期投资量
SumSC	自我批评组 C 本期自我批评程度	ConB _(t+1)	被试 B 滞后一期投资量
SumOA	批评组被试 A 本期批评程度	ConC _(t+1)	被试 C 滞后一期投资量
SumOB	批评组被试 B 本期批评程度	ECon	单个被试本期投资量均值
SumOC	批评组被试 C 本期批评程度	ECon _(t+1)	单个被试滞后一期投资量均值
SumBA	批评组被试 B 对 A 的批评程度	EmoG	感性引导程度
SumCA	批评组被试 C 对 A 的批评程度	RatG	理性引导程度
SumAB	批评组被试 A 对 B 的批评程度	EmoA	被试 A 的感性引导程度
SumCB	批评组被试 C 对 B 的批评程度	EmoB	被试 B 的感性引导程度
SumAC	批评组被试 A 对 C 的批评程度	EmoC	被试 C 的感性引导程度
SumBC	批评组被试 B 对 C 的批评程度	RatA	被试 A 的理性引导程度
Pro	单个被试本期收益	RatB	被试 B 的理性引导程度
ProA	被试 A 本期收益	RatC	被试 C 的理性引导程度
ProB	被试 B 本期收益	Gender	性别
ProC	被试 C 本期收益	CCP	是否党员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 3 中左半部分记录了各设置中 Sum 和 Con 的均值和方差,右半部分记录了各设置的第一期分类别个体投资量的均值。其中,自我批评组和批评组全 10 期的 Sum

分别为 24.39 和 22.70、Con 的均值分别为 8.13 和 7.57，自我批评组的 Sum 和 Con 均高于批评组的，并且两者都显著高于基准组的平均值（14.33、4.78），假设一、二、三都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此外比较表 3 右半部分 Con 第一期的均值发现（本文中公共物品的投资量从第二期开始将会受到前一期收益的影响，因此第一期中个体投资量才能更好刻画个体自愿的公共物品投资量），男性公共物品投资量高于女性（与陈叶烽和何浩然（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20]党员公共物品投资量高于非党员。为了规避性别、社会角色等非制度因素的作用，后文在涉及到个体投资量的回归中均将性别和是否是党员作为控制变量，以更好的研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效应。

表 3 Sum 和 Con 均值比较

设置	Sum	Con	Con（第 1 期）			
	10 期小组均值	10 期小组均值	男性	女性	党员	非党员
设置 I	14.33 (7.182)	4.78 (3.051)	5.00 (2.055)	3.82 (2.483)	7.0 (1.414)	4.11 (2.233)
设置 II	24.39 (8.489)	8.13 (3.141)	8.27 (2.944)	7.99 (3.330)	9.36 (1.993)	7.76 (3.329)
设置 III	22.70 (8.578)	7.57 (3.498)	7.68 (3.968)	7.34 (3.242)	7.70 (3.722)	7.46 (3.323)

注：第一行数据表示均值，括号内数据表示标准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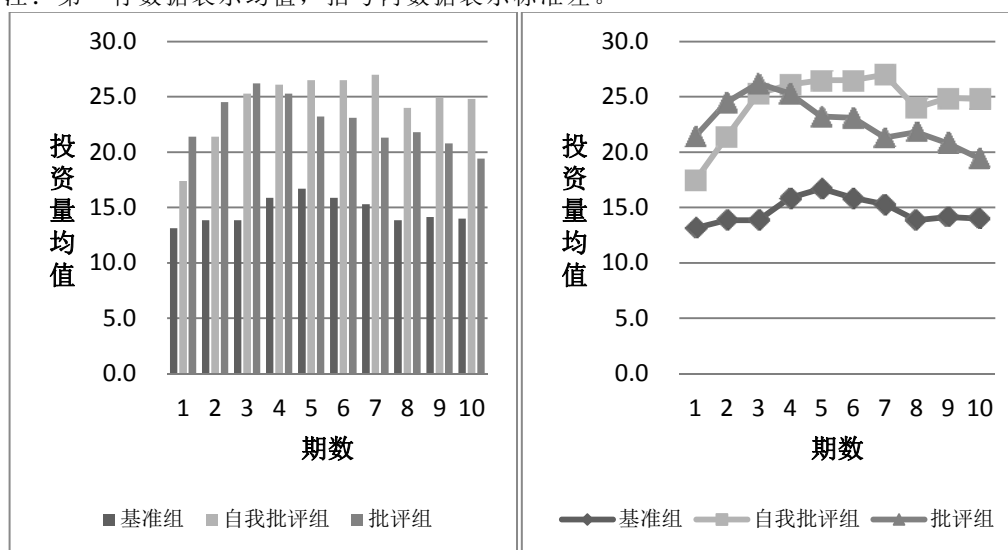


图 1 基准组、自我批评组、批评组各期投资量均值

为了更加直观的展示出不同制度的效应，我们依据实验数据得到图 1 结果。基准组 10 期中所有的小组投资量均低于 20 点，而自我批评组从第 2 期开始均高于 20 点，批评组除第 10 期外均高于 20 点，加入自我批评和批评设置后的小组各期平均投资量明显高于基准组中各期小组平均投资量，自我批评和批评制度的有效性得到证明，假设一、二进一步获得支持；比较自我批评组和批评组可以发现，在自我批评组中有 5 期高于 25 点，而批评组中只有 2 期高于 25 点，说明自我批评设置相对于批评设置而言更有效，假设三再次得到支持；右图中，在第 3 期和第 4 期时批评组和自我批评组达到效率最高点，此后自我批评组的高效率一直持续到第 7 期，从第 8 期开始略有下降，而批评组从第 4 期开始明显下降并且始终低于自我批评组，自我批评制度效应比批评制度效应更长更稳定，源于自内心的行为改变比屈从于外界压力而做出的改变要稳定；从自我批评组和批评组前三期曲线的斜率来看，自我批评组曲线斜率显著大于批评组曲线斜率，在提升小组投资量上自我批评比批评显

然更有效率，支持假设三。

(三) 回归分析

将小组批评或自我批评程度均值 ESumG 和本期平均投资量 Econ 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批评组中 ECon 对 ESumG 正相关 (0.151)，但是不显著；自我批评组中 ECon 对 ESumG 的显著负相关 (-0.291***)。二者个体本期投资量和本期自我批评或批评程度的回归结果见表 4 和表 5。表 4 自我批评组中 SumSA、SumSB 和 SumSC 均与 Sum 和 Con 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而表 5 中批评组中 SumOA、SumOB 和 SumOC 与 Sum 和 Con 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不显著；表 4 自我批评组中成员各自的自我批评程度 SumSA、SumSB 和 SumSC 均与自身投资量 ConA、ConB、ConC 显著负相关、与小组其他成员投资量正相关，与自身收益 ProA、ProB、ProC 正相关、与小组其他成员收益负相关，表 5 批评组中相应的关系为反向的。我们猜想可能是受到被试的记忆能力限制，上述的相关关系并不是都显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模型中设定的合理性。显然，被试在对自己和小组成员的决策行为作出评价时会一定程度上依赖实验中公布的 Sum、Pro 和 Con，通过对比自己和成员的行为作出评价，自我批评制度和批评制度效应明显，假设一、二再次得到支持。

表 4 自我批评组本期自我批评程度回归结果

自变量	A			B			C		
	因变量	系数	R ²	因变量	系数	R ²	因变量	系数	R ²
Sum	SumSA	-0.104*** (0.022)	0.193	SumSB	-0.088*** (0.018)	0.388	SumSC	-0.102*** (0.015)	0.319
Con	SumSA	-0.361*** (0.049)	0.363	SumSB	-0.325*** (0.041)	0.534	SumSC	-0.283*** (0.045)	0.296
ConA		-0.508*** (0.070)			0.011 (0.044)			0.091 (0.055)	
ConB	SumSA	0.199** (0.090)	0.417	SumSB	-0.446*** (0.057)	0.584	SumSC	0.039 (0.070)	0.329
ConC		0.031 (0.089)			0.186** (0.059)			-0.182** (0.070)	
ProA		0.230*** (0.083)			-0.260*** (0.060)			-0.222*** (0.066)	
ProB	SumSA	-0.477*** (0.098)	0.417	SumSB	0.197*** (0.063)	0.584	SumSC	-0.273*** (0.077)	0.329
ProC		-0.309*** (0.089)			-0.435*** (0.056)			0.130* (0.069)	

注：(1) *、**、***分别表示在 0.1、0.05、0.01 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数据表示标准差。

表 5 批评组本期批评程度回归结果

自变量	A			B			C		
	因变量	系数	R ²	因变量	系数	R ²	因变量	系数	R ²
Sum	SumOA	0.022 (0.020)	0.065	SumOB	0.020 (0.016)	0.122	SumOC	0.006 (0.009)	0.031
Con	SumOA	0.076* (0.034)	0.081	SumOB	0.039 (0.066)	0.098	SumOC	0.109*** (0.034)	0.195
ConA	SumOA	0.085* (0.050)	0.112	SumOB	-0.128*** (0.073)	0.136	SumOC	-0.096** (0.039)	0.260

ConB		-0.112*		0.054		-0.048			
		(0.065)		(0.089)		(0.049)			
ConC		-0.082		-0.046		0.167***			
		(0.059)		(0.082)		(0.043)			
ProA		-0.030		0.009		0.119***			
		(0.061)		(0.079)		(0.042)			
ProB	SumOA	0.167**	0.112	SumOB	-0.174*	0.136	SumOC	0.070	0.260
		(0.069)			(0.095)			(0.053)	
ProC		0.027			0.074			-0.144**	
		(0.073)			(0.101)			(0.057)	

注：(1) *、**、***分别表示在 0.1、0.05、0.01 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数据表示标准差。

被试本期受批评程度与投资量和收益回归结果见表 6。从结果来看，个人受到团队其他成员的批评程度与本期自身投资量显著负相关，与其他成员本期投资量没有确定相关关系。但是，个人受到团队其他成员的批评程度与本期自身收益显著正相关的同时与团队其他成员本期收益显著负相关。因此，我们可以说，团队合作中对他人的行为作出评价时，人们会更多的依据决策的结果而不是决策的过程，结果的导向作用更加明显。在批评时明确结果导向可以提升批评的制度效应。

表 6 被试本期受批评程度回归结果

自变量	A			B			C		
	因变量	系数	R ²	因变量	系数	R ²	因变量	系数	R ²
ConA		-0.209***			-0.031			0.061***	
		(0.025)			(0.025)			(0.039)	
ConB	SumRA	0.048	0.506	SumRB	-0.095***	0.194	SumRC	-0.011	0.392
		(0.033)			(0.031)			(0.049)	
ConC		0.071*			0.096***			-0.113***	
		(0.030)			(0.028)			(0.043)	
ProA		0.050***			-0.029*			-0.109***	
		(0.017)			(0.015)			(0.010)	
ProB	SumRA	-0.156***	0.414	SumRB	0.070***	0.116	SumRC	-0.051***	0.376
		(0.021)			(0.019)			(0.013)	
ProC		-0.188***			-0.106***			0.059***	
		(0.022)			(0.020)			(0.014)	

注：(1) *、**、***分别表示在 0.1、0.05、0.01 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数据表示标准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小组本期的投资量，那么本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程度是否会影响到下一期的投资量呢？将公共物品投资量滞后一期与批评和自我批评程度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7。自我批评组中滞后一期的投资量与自身自我批评程度正相关，自省提高了公共项目投资量，自我批评展现出其制度效应；批评组中滞后一期的投资量与自身受到批评程度负相关，与自己批评他人的程度正相关。其他成员对自己的批评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反而展现出惩罚的毁灭性效应，促进合作的作用不明显，而自己对他人要求较高的被试也会高水平要求自己的决策，增加投资量，这两种力量相互较量，形成最终的决策结果。

表 7 自我批评组与批评组滞后一期回归结果

自我批评组				批评组			
自变量	因变量	相关系数	R ²	自变量	因变量	相关系数	R ²

SumSA		0.019 (0.164)		SumBA		-2.449*** (0.597)	
SumSB	ConA _{t+1}	-0.732*** (0.237)	0.243	SumCA	ConA _{t+1}	-1.587*** (0.245)	0.339
SumSC		-0.484** (0.219)		SumOA		0.326*** (0.112)	
SumSA		-0.076 (0.123)		SumAB		-0.656* (0.348)	
SumSB	ConB _{t+1}	0.143 (0.186)	0.517	SumCB	ConB _{t+1}	-0.244 (0.574)	0.034
SumSC		-0.543*** (0.543)		SumOB		0.089 (0.112)	
SumSA		-0.085 (0.126)		SumAC		-2.479*** (0.464)	
SumSB	ConC _{t+1}	-0.782*** (0.178)	0.423	SumBC	ConC _{t+1}	-1.325*** (0.607)	0.110
SumSC		0.541*** (0.165)		SumOC		0.100 (0.175)	

注：(1) *、**、***分别表示在 0.1、0.05、0.01 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数据表示标准差。

为进一步分析批评组中促进合作的机制，进一步将其中的引导类语句与投资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8 和表 9。

表 8 批评组各类引导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系数	R ²
SumBA	ConA _{t+1}	-2.159*** (0.597)	0.318
SumCA		-1.712*** (0.244)	
SumAB	ConB _{t+1}	-0.618* (0.344)	0.032
SumCB		-0.333 (0.563)	
SumAC	ConC _{t+1}	-2.524*** (0.601)	0.108
SumBC		-1.384*** (0.452)	

注：(1) *、**、***分别表示在 0.1、0.05、0.01 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数据表示标准差。

表 8 中 ConA_{t+1}、ConB_{t+1}和 ConC_{t+1}与各自受到的批评程度负相关，并且除了 SumCB 对 ConB_{t+1}的影响不显著之外，其余五个均显著，这说明小组成员不会因为受到的批评程度的增加而提高自己公共物品的投资量，相反的，可能是出于逆反心理，反而会降低自己的投资量。表 9 中 A、B 和 C 各自的感性引导和理性引导都与 Con_{t+1}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团队理性引导的作用优于感性引导的作用。这说明团队成员之间的具体明确的策略互动可以更好的促进成员间信任的建立，提升合作水平。因此，我们认为在批评制度设置中对群体合作起正向作用的是团队成员积极的引导而不是单纯的批判。

表 9 批评组各类引导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系数	R ²	系数	R ²
EmoA		0.646** (0.310)			
EmoB	Con _{t+1}	0.279 (0.247)	0.038	0.308** (0.139)	
EmoC		0.290 (0.313)			0.059
RatA		0.510 (0.357)			
RatB	Con _{t+1}	0.080 (0.391)	0.248	0.330*** (0.126)	
RatC		1.599*** (0.480)			

注：(1) *、**、***分别表示在 0.1、0.05、0.01 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数据表示标准差。

四、结论与启示

制度取决于个体的偏好，但这个过程是双向的，即制度反过来可以塑造个体偏好。这提供了从制度设计角度提高公共物品投资量的可能性，给予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效应的理论支持。

(一) 公共决策中制度约束同参与主体双向互动

群体的兴盛、衰败与制度的创新、传承和桎梏紧密关联，而后者又与群体成员的偏好息息相关。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在自我批评制度下：成员的自我批评程度与自己本期公共物品投资量负相关、与他人本期公共物品投资量正相关，与自己本期投资收益正相关，与他人本期投资收益负相关；滞后一期公共物品投资量与其自我批评程度正相关，与他人的自我批评程度负相关。在批评制度框架下：成员的批评程度与自身本期公共物品投资量正相关，与他人本期公共物品投资量负相关，与自己本期投资收益负相关，与他人本期投资收益正相关；批评组中滞后一期的投资量与自身受到批评程度负相关，与自己的批评程度正相关。不管是自我批评制度还是批评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小组公共物品的投资量，表明自我批评和批评制度都可以提升努力水平，促进团队兴盛。制度提升了群体成员的利他偏好。不同的制度对于拥有它的群体作用是不同的：相较于批评制度自我批评制度的作用更明显，并且持续时间更长，更稳定；批评制度框架下成员的积极引导比批判责备对提升公共物品投资量更加有效，成员间更加偏好内部激励而不是外部约束。这些都是异质性的个人偏好在不同制度或者相同制度不同实施环境下的差异性表现，折射出参与者个人偏好对制度演化反作用。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制度被理解为机制设计、重复博弈规则和行为人的演化博弈。用演化博弈分析制度时通常从大群体的行为协调切入，着重分析在缺乏第三方干预时制度如何在分散决策的个体群之间生成和演化，批评与自我批评正是不存在第三方干预的情况下党组织内部的群体协调过程，不断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规则固化，形成党员群体中的行为“惯例”。“惯例”作为党组织自我秩序实施的结果，诱导参与公共选择的党员将决策情景和实际行动匹配起来，自然而然的或者屈从于群体压力的采取先前固化的特定行为。宣传和教育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诱发出个人心底的利他偏好，战胜自利偏好，提升公共物品投资量，促进外生制度效应的发挥。但是，当个体的自尊被过分践踏，内心受到伤害，个体的自利偏好将完胜利他偏好导致外生制度失效，合作崩溃。合作行为显示的脆弱性印证了制度传承对群体公共决策的影响。就像重复博弈中合作的出现依赖某些特定的策略、制度和条件，当相应的条件无法满足时合作就会随之发生变化一样，相同的制度传承到不同时期时的

作用也不尽相同。

（二）党员理性为公共决策贡献新解

从 1921 年建党至今，尽管党员队伍的总体战斗力有目共睹，但毋庸讳言，也确实存在着党员素质参差不齐、党性观念弱化、“老好人”等等问题。许多党员对自身和组织的定位存在偏差，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严重，受制于自身个体、组织部门和国家政府三者利益的冲突，这些都是“行为人”和“心理人”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无论政治市场还是经济市场，同质化自利偏好的理性参与人假定是不符合心理事实的，每一个独立的行为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偏好（纯利他、互惠、不平等厌恶等）。^[21]这些社会偏好的存在促使个体决策时考虑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偏好，提升了群体的协调水平。社会偏好依附于社会角色，不同的社会角色促成了个体差异性的行为模式。相比于一般的“社会人”，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起，党员身份便成为了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标识。党员是党组织赋予的一种特殊社会角色，“共产党人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2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是理想更是信念。党员角色赋予了党员作为党员个体或者作为整个党组织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时的利公偏好，^[23]利公偏好驱动党员决策时思忖党的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表现出高于一般社会人合作水平。

党员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策主体，是党的基本组成构件。作为基层党组织（党小组）中决策的参与者、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的践行者，其决策行为直接关系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效应的发挥和党治理效率的提升。党员，一种社会角色，既有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利己之心，也具备获取社会认同的基于社会偏好的利他之意。自利偏好、利他偏好和利公偏好构成特定的党员理性，成为党员公共决策的内在驱动：“理性人”追求自身效应最大化引发党员自利偏好，可能促使党员侵害组织利益；“行为人”的利他偏好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减自利偏好的作用，提升组织协调水平；党员角色承载的利公偏好驱使党员重视组织整体利益。党员理性是党员在党内信念约束力下产生的人性的附属产品，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实施的人性基础。作为提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的效应的切入点，党员理性为党组织公共决策的相关均衡贡献新解。

（三）政党治理中顶层设计“显隐结合”、“内外互补”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24]作为政党顶层机制设计的典范，是基层党组织中的制度平台。它将分散的、有利益冲突或者价值冲突个人进行整合，促使各方形成共识、达成合作，落实党的治理先进性、合法性、责任性、廉价性、有效性等“五性”要求，满足政党治理现代化、科学化和制度化。“政党治理”和“政党管理”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是党在执政实践中的重大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治理能力”的概念。所谓“治理”，即用规则和制度来约束和重塑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达成决策科学化的目的，它是以规则、合规和问责为核心要素，注重顶层设计，协调多元利益主体的一整套制度安排。^[25]治理不同于管理中以结果控制为导向，它强调过程化，是围绕“合规、规则和问责”不断演化的过程。正如我们所知，参与政党实务的组织和个人所进行的都不是一次性的博弈，而是多次互动的重复博弈，这就意味着要实现良好的治理效果，成员内部要具备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主动披露和被披露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信息，及时反馈与引导，使彼此的行为可预测，充分地发挥制度的作用。

制度效应的发挥提高依赖于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隐性激励作为显性激励的内在补充。“隐性激励”就是类似于声誉、团队信任的建立、非正式的奖励以及其他同等的补偿。在实际的合作博弈中，合作往往是靠隐性的规则和激励来维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是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的结合，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谋求可持续性

发展的理性选择。在当下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实现从传统“政党管理”到现代“政党治理”转型必须取得人民群众对党的显性认同与隐性信任。“为官有为”，发挥好以上率下的关键作用，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一级管一级、一级监一级、一级率一级。实现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常态化、落到实处，及时召开民主生活会，“红红脸、出出汗”，^[26]警钟长鸣。显性监督激励横向延伸，覆盖基层，全面开展纪律教育、执纪监督，塑造高监督、高信任、高合作的政党外部治理组织。严明纪律底线的同时要引导党员内心向善向上，时刻谨记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显性规则与隐性价值的引导相结合、内部与外部相协调，在政党治理转型的关键时期始终做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定的执行者和忠实的捍卫者。

（四）树立防微杜渐、自我升华的反腐理念

“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强无畏的政治勇气、坚韧不拔的政治定力，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7]“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28]但是屡禁不止的腐败之风依然是党治理转型路上的绊脚石。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制度的缺陷，“制度反腐”^[29]强调依赖于反腐制度的建设而不是群众运动或者是权利配置来遏制腐败现象。它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从外部健全监督组织体系，通过科学性、规范性、可操作性的惩罚手段隔离滋生腐败现象的沃土，为“不能腐”、“不敢腐”创造条件；二是从内部建立廉洁文化体系，革新官员执政理念，提升廉洁意识，磨灭腐败念头，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的种子，为“不想腐”提供可能。结合当下网路反腐的外部环境的威慑力和警示性，对“为官不为”现象“对号入座”，将权力的制约协调到制度的设计上，激发参与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制度效应。

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举国上下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不可否认，批评与自我批评确实是党组织外部监督机制和内部反思廉洁意识的良好载体，是党反腐倡廉的利器。但是，任何一项制度都有自己适用的对象和范围。从实验研究结果来看，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较小范围内有较好的制度效应，也就是说这一制度安排更适合于党的基层组织。这并不是否认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反而是对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在基层反腐中效应的肯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的腐败并不是今时今日骤然出现的，而是过去日积月累的结果，是先前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基层党组织制度效应发挥不彻底的必然。“若敕政责躬，杜渐防萌，则凶妖消灭，害除福凑矣。”^[30]，实施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立足基层、防微杜渐，充分发挥批评的督监效应。从根上入手，落实自我批评的内省作用，帮助基层党员成长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31]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此外，要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施力度，过轻没有作用，过重人心惶惶。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3-1094页。
- [2] 刘云山：《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几点认识》，中共中央党校2013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讲话，北京，2013年9月1日。
- [3] 刘云山：《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几点认识》。
- [4] Faillo M、Smerilli A、SugdenR,“The roles of level-k and team reasoning in solving coordination games,”*Ceel Working Papers*, 2013.
-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0-311页。
- [6] 彭勃、邵春霞：《组织嵌入与功能调适：执政党基层组织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

年第 13 卷第 2 期。

- [7] Carrillo J D、Mariotti T, "Strategic Ignorance as a Self-Disciplining Devic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67, no.3, 2000, pp.529-544.
- [8] Strotz R H, "Myopia and Inconsistency in Dynamic Utility Maximiz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23, no.3, 1955, pp.165-180.
- [9] Tjosvold D, "Defining conflict and making choices about its management: Lighting the dark side of organizational lif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vol.17, no.2, 1990, pp.87-95.
- [10] 孙卫、张颖超、尚福菊等:《创业团队冲突管理、团队自省性与创业绩效的关系》,《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 年第 6 期。
- [11] 宋紫峰、周业安、何其新:《不平等厌恶和公共品自愿供给——基于实验经济学的初步研究》,《管理世界》2011 年第 12 期。
- [12] 《论语精解》,刘建生主编,北京:海潮出版社,2012 年,第 74 页。
- [13] 马永远:《新产品开发团队时间压力、自省性与创新绩效》,《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 年第 5 期。
- [14] Xiao E and Houser D, "Emotion expression in human punishment behavio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102, no.20, 2005, pp.7398-7401.
- [15] Carpenter J P, "The demand for punish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62, no.4, 2007, pp.522-542.
- [16] 《中国共产党章程》,2012 年。
- [17] 史密斯:《实验经济学论文集》,李建标等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 年,“序言”第 9—10 页。
- [18] Smith V L, "Constructivist and Ecological 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3, no.3, 2003, pp.465-508.
- [19] Smith V L, "Microeconomic Systems as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2, no.72, 1982, pp.923-955.
- [20] 陈叶烽、何浩然:《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自愿合作水平——基于公共品博弈实验数据的分析》,《经济学家》2012 年第 5 期。
- [21] Fehr E and Fischbacher U, "Why Social Preferences Matter - The Impact of Non-Selfish Motives on Competition," *IEW - Working Papers*, 2002, pp.C1-C33.
- [22]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85 页。
- [23] 祝灵君:《党的形象建设中的公共选择分析》,《理论与改革》2003 年第 2 期。
- [24] 习近平:《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问题能力》,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河北,2013 年 9 月。
- [25] 李维安,《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树立现代治理理念》,《光明日报》2013 年 11 月 29 日,第 11 版。
- [26] 王岐山:《王岐山:立足当前谋划长远与时俱进推动制度创新》,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北京,2015 年 7 月。
- [27] 王岐山: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主持词,北京,2016 年 1 月 12 日。
- [28] 习近平:《全党对反腐败斗争要有“四个自信”》,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北京,2016 年 1 月 12 日。
- [29] 刘占虎:《制度反腐、过程防腐与文化倡廉——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探索与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 年第 1 期。
- [30] 范晔:《后汉书》(上册),长沙:岳麓书社,1994 年,第 544 页。
- [31]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同志》,1939 年 12 月。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institutional effect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public goods

LI Jian-biao^{1,2,3} LIU Xiao-li^{1,2,3} LI Wei-an^{1,4} FU Xiao-gai^{1,2,3}

(1. Nankai University China Academ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2. Nankai Business School; 3.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hina Economy; 4. Ti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An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s agreed all or majority through the public choice. When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as a sty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r system effect usually is uncertain. Good performance for the style makes contribution in the party's strength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style is distortion, it will result in the party's lose, even detour. But i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could be sublimated into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ts effect will be relatively stable. System of primary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is a breakthrough behavior orientation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social distress of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public goods game, we can reveal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informations for the party's modernization management.

Key words :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institutional effect; Public goods game ;
dExperimental study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372094”、“71533002”、“71132001”、“71172068”);

作者简介: 李建标(1965-), 男(汉族), 山东潍坊人, 南开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刘晓丽(1989-), 女(汉族), 山东潍坊人, 南开大学博士生, 博士生导师;

李维安(1957-), 男(汉族), 山东青岛人, 南开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付晓改(1982-), 女(汉族), 河南漯河人, 南开大学博士生。
